

# 论吴澄对经学著作的改编

## ——以《礼记》《尚书》为例

施汝康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DOI:10.61369/HASS.2025040023

**摘要：**元代作为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其经学发展呈现出独特的融合性特征。吴澄（1249—1333），是元代著名的经学家，也是这一转型期的代表人物。他既承袭理学衣钵统治者通过尊崇程朱理学强化思想控制，又突破宋儒藩篱，在经典重构领域展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其重要的经学成就之一，就是对经学著作进行了改编，其中，《礼记纂言》和《书纂言》，分别是吴澄对《礼记》和《尚书》的修订改编版本，本文就试图以这两部著作为例，分析吴澄对经学著作的改编方式、疑经改经的主要特点以及其中透露出的经学思想。

**关键词：**元代；吴澄；经学改编；经学思想

### On Wu Cheng's Adaptation of Classical Works — Taking the Book of Rites and the Book of Documents as Examples

Shi Rukang

Shando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Advanced Confucian Studies,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As a dynasty ruled by ethnic minorities, the Yuan Dynasty's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classics exhib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ation. Wu Cheng (1249–1333), a renowned Confucian scholar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his transitional period, not only inherited the principles of Neo-Confucianism, where rulers strengthened ideological control through the veneration of Cheng-Zhu Neo-Confucianism, but also broke free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Song scholars, showcasing a distinct personal style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lassics. One of his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Confucian classics was the adaptation of Confucian texts. Specifically, "Zuan Yan of The Book of Rites" and "Zuan Yan of The Book of Documents" are his revised versions of "The Book of Rites" and "The Book of Documents," respectively.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Wu Cheng's methods of adapting Confucian classics, the main features of his critical and adaptive approaches, and the Confucian thought revealed in these works.

**Keywords：** Yuan Dynasty; Wu Cheng; adaptation of classics; thought of classics

#### 前言

《礼记纂言》收录了原本《礼记》的三十六篇，并对其中的十九篇进行了章节断句上的调整。侯外庐先生有评价言：“在元代，治《礼》学的虽然也不乏其人，但只有吴澄成绩较大。”但是，吴澄的《礼记纂言》相较另一部元人礼学著作——陈澧的《礼记集说》，得到的关注并不多。二者相比，陈澧侧重训诂疏通，以服务科举为目的；吴澄则致力于经典体系的重构，其改编包含三重维度——文本校勘（补脱正讹）、结构重组（调整篇次）、义理整合（划分章节）。这种差异源于不同的学术追求：前者是经学教育的普及者，后者则是经典体系的革新者。

《书纂言》则是吴澄所著的一部《尚书》学著作，尽管当时蔡沈《书集传》已经成为业界的权威注本和元朝的官方定本，但《书纂言》对《尚书》所作注解实质上已是对《书集传》的随文注释，其特点是：尊朱宗蔡、专释今文、疑经改经。吴澄在《书纂言》疑经改

经力度上远超前儒。

事实上，吴澄的《礼记纂言》和《书纂言》之所以别具价值，正在于其对《礼记》《尚书》原本的疑经改经，在于其对前人经学研究的回顾和思考，也可以窥见其自身独特的经学思想阐发。吴澄师承程若庸，程若庸拜师于饶鲁，饶鲁又是黄榦的学生，故吴澄为朱子嫡脉，又志于“绍朱子之统”，继承了宋人尤其是朱子之学的学术风格。吴澄曾在《礼记纂言》之序中写道：“呜呼！由汉以来，此书千有余岁矣。而其颠倒纠纷，至朱子始欲为是正而未及竟，岂无所望于后之人与用。敢窃取基意，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伦，先后始终，颇为精审。将来学礼之君子，于此考信，或者共有取乎，非但为戴氏之忠臣而已也。”在吴澄看来，其编纂《礼记纂言》《书纂言》，是继承朱子遗志，完成了朱子晚年的未竟之志，可以质诸千古，俟诸后来。吴澄对《礼记》《尚书》的章节次序、语句排列等作出修改，更是突破朱子方法论：朱熹主张通过义理贯通解决文本矛盾，吴澄则转向文献考证恢复经典原貌。这种转变体现在具体实践中：朱熹注《大学》主要调整章节次序，吴澄则进一步补脱文、正讹字，开展文本校勘。这种从“义理优先”到“文本优先”的转变，预示着经学研究范式的转型，既是对宋人学风的继承，更是对宋人学术的突破。哪怕是清代的四库馆臣，虽然批评吴澄说“改并旧文，俨然删述，恐亦不免僭圣之讥”，但也不得不承认《礼记纂言》“排比贯串，颇有伦次，所解亦时有发明”。

## 一、《礼记纂言》的改编模式

吴澄《礼记纂言》对《礼记》原本的改编方式主要有三种，即“改变篇章次序”“补脱文”和“正讹文”。以其中《礼运》篇的改编模式为例：

一是改变篇章次序，即改变文中语句的先后次序。

《礼运》篇有“孔子曰：‘呜呼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

此段原本在“此礼之大成也”下，“祝嘏莫敢易其常古”上，吴澄改至前文“吾以是观之”下，“夫礼之初”上。

之所以如此修改，是因为他将《礼运》篇分为五节，自“夫礼之初”至章末皆属第五节，在这一节，皆是礼的具体要求。因此，在其中插入一段孔子的言论似乎不妥，便将其移至“夫礼之初”前。且此段“我观周道”，接续前文孔子“我欲观夏道”“我欲观殷道”之言，引出下文对各种礼制的叙述，似更妥帖。这种调整体现吴澄对文本逻辑的重视，原本孔子言论插入礼制叙述，导致“述礼”与“论礼”层次混杂，通过移位使全篇形成清晰的对话结构。

另一种修改方式是补脱文。

《礼记》原文曰：故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焉；……礼行于祖庙，而孝慈服焉；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

吴澄注曰：“孝慈服焉”下阙“礼行于山川而报功德焉”十字，今补之。

故修改后的语句是：故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焉；……礼行于祖庙，而孝慈服焉；礼行于山川，而报功德焉；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

此处吴澄所修改的语句，皆是有所排比，或者前后对应的语句，其修改文字，恢复了经文的完整性，提升了经文的文学性，也使读者更加容易理解经义。

此外，就是改正讹文之处。

《礼记》原文曰：五行之动，迭相竭也。……还相为本也。……还相为官也。五味、六和、十二食，还相为质也。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

吴澄注曰：还相有质有二，下句“质”字，《家语》作“主”，今按上句“质”字宜为“主”字。五味为六和之十二食所负载，则每食各有酸、苦、甘、辛、咸，还相为十二食之主，而味之数亦共有六十矣。

吴澄把第一处的“还相为质也”修改为“还相为主也”。这体现了其对文字训诂的重视，也说明了其对排比语句中用字的关注，他在其注中详细注解“本”“官”“主”“质”等字，可见其对经文本的严谨。

吴澄的文字校订还包含三重考证：第一，版本校——引《孔子家语》异文；第二，理校——通过数理推算（“味之数亦共有六十”）；第三，文例校——保持排比句式用字统一。这种多维考证法突破传统经注模式，将数学思维引入经学研究。其“十二食六十味”说虽受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启发，但具体论证更具系统性，直接影响后世学者的著述方式。

## 二、《书纂言》的疑经改经方式与解经特点

吴澄《书纂言》对《尚书》原本的疑经改经则体现在以下六方面。

1. 疑经有讹字而改之。如《皋陶谟》篇内改字、《益稷》篇内改字、《金縢》篇内改字等。

2. 改易经文篇目前后次序。主要在《自序》中对篇目顺序作了改动。如《多士》挪到了《立政》之后；《康诰》《酒诰》挪到了《金縢》之前；《多方》和《立政》挪到了《大诰》之后。

3. 疑篇内错简，改易经文次序。如《舜典》篇内错简衍文、《禹贡》《禹贡》《洛诰》《多方》等篇内错简。

4. 疑诸篇错简，改移重组经文。如《康诰》《梓材》错简、《多士》《多方》错简、《康诰》《酒诰》与《金縢》错简、《舜典》、《益稷》错简衍文等。

5. 疑篇目分合。如《皋陶谟》和《益稷》合为一篇、《盘庚》三篇合为一篇、《尧典》《舜典》合为一篇、《康王之诰》《顾命》合为一篇等。

6. 不释古文。如《舜典》前二十八字删除、《皋陶谟》删除古文等。

吴澄疑经改经之渊源颇广，汉宋诸儒之疑经改经之说，皆有

取之。其解经特点主要是渊源朱熹、推崇蔡说。《书纂言》经解上沿用了朱子的理论体系，明引朱子学说的内容多是疑经辨伪和经义解说，明引《蔡传》也多达 20 多次，可见吴澄还是较为认可《蔡传》的，更不能说《书纂言》是驳蔡之作。

吴澄还专释今文，摈弃古文，推动了古文《尚书》辨伪工作。在《书纂言》目录中分别归类了今文、古文，并于古文《尚书》目录后言曰：窃尝读之伏氏书，虽难尽通，然辞义古奥，其为上古之书无疑。

吴澄在疑经改经中注重以求全经。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弄清经文史实、恢复经文原貌。

综上，吴澄在《书纂言》的解经方法突出了以经为史的基本观点，在保持宋儒路径的基础上加重了训诂比例，并由单一的义理阐释往求实的历史考证转向。

### 三、吴澄疑经改经的原因

尽管《四库总目》中曾批吴澄随意改经之说，但通过对《礼记纂言》《书纂言》等著作的细细解读，笔者认为其疑经改经还是有其考量和意图的。如《经传考异序》中就对其初衷作了解释：

吴澄少时读书发现经文中有许多难以理解和不可通晓之处，以为是文字或者记载中的错误，就自行改之，但却受到长辈们的斥责。后来越来越认为这口口相传或文字记录造成的记载错误，如果不加以修正，简单按记载错误的文本来解读经书，这岂不是亵渎了圣人的谆谆教诲，更无法追求圣人的智慧和道德境界。吴澄正基于此而有研究、有逻辑地予以改之，而非简单的随意窜改经文。

此外，古文辨伪和回归文献寻找证据也逐渐成为那个年代经学争论和研讨的大趋势。吴澄也正是通过确认古文《尚书》之伪，疑改经文次序，重组经说，论证了朱子构建的道统的正确性，也算是在前代古文辨伪和道统维护的基础上再迈出了实质性一步。同时，元代新朝建立需要实现文化和思想上的统一，这就需要统一的经典文本和新标准加以引导，元儒就对前代的经学思想和文本进行了修正、反思和改造，以不断适应新的环境和大势。其中吴澄的疑经改经也是整合了前代诸家之说，补充了自身研学思想，不是简单延续，而是弥合完善。综上，不论是从经学思想自身发展趋势看，还是从统一大众思想和重塑时代精神角度分析，《书纂言》等代表性著作也就在这疑经改经的历史大环境下加之其自身研学修为得以完成的。

当然，元朝多元文化的冲突为吴澄也提供了良好契机。一方面，统治者需要确立文化正统性，支持经典整理；另一方面，相对宽松的思想控制允许学术创新。吴澄巧妙利用这种环境，将经典改编与政治合法性建构结合。这种策略使其既获官方认可，又保持学术独立性。此外，科举停废带来的学术自由，使得学者不必拘泥标准注疏，为吴澄大胆改经创造条件。

### 四、吴澄疑经改经所揭示的经学思想

通过深入了解和细细解读吴澄在《礼记纂言》和《书纂言》中的改编，我们可以管窥到其独特的经学思想。

首先，吴澄并不是简单的把经文原原本本地当作不可修改的神圣之物，而是秉持着一种为经文恢复原貌的使命感。其《三礼

叙录》就提到：“汉兴，得先儒所记礼书二百余篇，大戴氏删合为八十五，小戴氏又损益为四十三，《曲礼》《檀弓》《杂记》分上下。马氏又增以《月令》《明堂位》《乐记》，郑氏从而为之注，总四十九篇，精粗杂记，靡所不有。秦火之余，区区掇拾，所谓存十一于千百，虽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遗制，圣贤之格言，往往赖之而存。第其诸篇，出于先儒著作之全书者无几，多是记者旁搜博采，剿取残篇断简，会萃成编，无复论次，读者每病其杂乱而无章。”故而，值得注意的是，吴澄的经典改编并非孤立现象。自中唐啖助、赵匡开启“舍传求经”之风，至宋代欧阳修疑《系辞》、朱熹重编《大学》，疑经改经渐成学术潮流。但与前人相比，吴澄的改编更加具有系统性：其一，他明确区分“经”与“传”，主张恢复经典原貌；其二，他将文本校勘与义理阐发相结合，形成“考据—义理”的双向互动；其三，他突破单纯文字校订，对经典结构进行整体重构。

其次，吴澄以绍述朱子思想，延续朱子“未尽之意”为己任，完成了由汉唐章句训诂之学向宋元义理注疏的转变，对五经深度的解析超越了其他朱子门人的成就。正如黄百家评价《五经纂言》所说：“考朱子门人多习成说，深通经术者甚少，草庐《五经言》，有功经术，接武建阳，非北溪诸人可及也。”

另外，吴澄注重研究经文内在逻辑。如上文提到的《礼运》篇章次序正是基于其对五个章节的划分理解而更改的。同时，吴澄将许多排比或是前后对应之处的经文补充，纠正对仗句式中的重复字词，可见其十分注重经文的规范性、文学性和工整性。

总的来说，从吴澄在《礼记纂言》《书纂言》等著作中可以看出其对经学脉络和思想的独到见解。在方法论层面，他开创“结构重组—文本校勘—义理阐发”的三位一体的研究模式，既运用文献考证，又依赖义理逻辑判断真伪，推动经学从注疏之学转向建构之学；在思想史层面，其工作既完成宋学内部自我修正，解决朱子未竟之业，又重视训诂考据，为汉学复兴埋下伏笔。明初编纂《礼记大全》时对吴澄成果的大量吸收，清儒编《钦定礼记义疏》亦对吴澄之学说有所讨论，皆证明其长久不衰的学术生命力，也凸显了其独特的学术风格，是经学历史上的重要一环。吴澄的经学著作，值得引起我们关注并作更深研究。

### 参考文献

- [1] 吴澄.《礼记纂言》.静嘉堂文库藏元统二年刻本.
- [2] 吴澄.《书纂言》.通志堂藏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 [3] 朱彬撰、饶钦农点校.《礼记训纂》.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 [4] 王先谦撰、何晋点校.《尚书孔传参正》，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 [5] 商赛博.《礼记纂言》的文献学研究[D].山东大学，2022.
- [6] 王丹.《元代〈尚书〉学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12月.
- [7] 曹子男.元代《尚书》训诂研究[D].扬州大学，2022.
- [8] 朱军.元代理学与社会[D].西北大学，2015.